

张忠培 / 许倬云 主 编
杨 晶 / 黎明钊 助理主编

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

(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科学出版社
Science Press

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

(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张忠培 主编
许倬云

杨晶 助理主编
黎明钊

科学出版社

2000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考古学会、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于1999年6月在河北易县西陵合作召开的“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内容分为三部分：回顾与展望、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专题研究。第一部分的论著，在检讨以往的考古学研究后提出了问题，或进行了展望。后两部分所辑论著，均为当前有关考古学前沿课题的研讨。我们将从这些论著中，既见到中国考古学已往的成就，又看到了她的现状及今后的走向。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研究者及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张忠培,许倬云主编;杨晶,黎明钊助理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ISBN 7-03-008558-2

I. 中… II. ①张… ②许… ③杨… ④黎… III. 考古学-研究-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61460号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新蕾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0年10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5 1/2
印数:1—1 500 字数:538 000

定价:8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杨中〉)

在“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 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1999 西陵)

张文彬

在新旧世纪之交,回顾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程,总结学术研究成果,展望未来发展前景,以推动中国考古学的更大发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认为由张忠培、许倬云两位先生主持召开的这个会议,是必要而适时的。

中国考古学是在 1919 年“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推动下诞生的。当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满怀爱国的激情,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此来谋求“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从而产生了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思想。这是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上古史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此同时,由于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和考古学重要成果的传播,特别是 1921 年和 1923 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和安特生对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关注。紧接着我国学者李济于 1926 年开始,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裴文中则在中美合作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发掘中于 1929 年发现了第一个较为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引起世界轰动。从 1928 年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河南安阳殷墟陆续进行了科学发掘,吴金鼎、梁思永先后主持了山东历城县城子崖的发掘,郭宝钧主持了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河南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战国时期魏国墓葬的发掘。此外,黄文弼、马衡分别对新疆和燕下都的考古调查,徐炳昶、苏秉琦对陕西斗鸡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夏鼐对甘肃省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和研究等,都为中国考古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考古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步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展示在世界学术界面前。其主要学术成就表现在:

1. 通过大量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对人类起源及其文化演进历程的探讨,证实中国境内的古人类体质特征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连续进化特点,在文化发展上存在着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境内是研究人类进化的重要地区之一。

2. 史前考古学文化编年与类型、谱系的建立,为中华古文化、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大约有七八千处,经过正式科学发掘的也有几百处,经过科学整理和采用自然科学手段测定年代,已建立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框架,为研究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条件。港台

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也获得重要成果,引起学术界关注。

3. 夏商周三代考古研究取得全面进展,令人振奋。自1928年起至今对殷墟70多年的考古发掘,已确认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国都所在。50年代初在郑州发现了郑州商城和二里冈商文化遗址,80年代初在偃师发现了早商都城,90年代又发现了郑州小双桥商代城址。由于对早商文化的深入了解,并且对夏文化的认识经过近40年的深入探索和研究,已大体确认了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即是夏文化,认为这里曾为夏都。这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项重大突破。周代考古收获之丰也是空前的。西周长安丰镐遗址、陕西岐山周原遗址以及西周封国,如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山西天马-曲村晋国遗址的发掘及研究成果,解决了众说纷纭的千年疑难,对历史学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依据。还应特别提到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墓葬的发掘,都是十分重要的发现。东周时期列国文化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也取得了突出成果。同时,还应特别提到的是,我们还在夏、商、周王朝统治区以内的中国境内,发现和确认了一批文化遗存,如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墓葬。通过这些遗存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当时文化上已形成以夏、商、周文化为中心的多元格局。

4. 秦汉及其以后各个历史时期考古学也有许多重要发现。秦始皇兵马俑坑和铜车马的发掘,以其宏伟气势和精湛技艺震惊了海内外。对历代帝王陵和历代城址的勘测及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在少数民族考古方面,也有许多重要发现,对研究各族文化特点、文化交融和中西文化交流都提供了重要的有价值的成果。

5. 对宗教遗物和石窟寺考古调查和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经过数十年的调查,已基本搞清了全国石窟寺的分布及各个时代石窟艺术的风格和特点,这些石窟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6. 简牍的重大发现与研究,丰富了人文科学研究的内容,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从简牍出土地区来看,不仅在西北甘肃居延、新疆楼兰、尼雅、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和内蒙古一带,而且在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等省都有重大发现。20世纪以来,简牍的重大发现同甲骨文、敦煌石窟经卷文书的发现一样,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要资料,在推动中国史学、哲学和经济、政治、法律 and 司法制度的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我们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辉煌成果并感到无比喜悦自豪时,我们深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是因为:

1.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具有不同特色和文化传统的族群,经过互相交流,最终形成了以汉民族为核心包含56个民族并具备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中华文化。辽阔的土地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2. 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为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和考古学的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20世纪上半叶,中国是在饱受内忧外患、外敌入侵和社会动荡中度过的。那时,虽然有前辈考古学者如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石璋如、郭宝钧、尹达、夏鼐、苏秉琦等诸位先生的艰苦努力,为中国考古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

于当时国内环境、资金、人力的限制,很难有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因此也难有全面系统的科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即开始有计划的大规模基本建设,这就使得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揭示中华古老文明的丰富宝藏成为可能,使世人看到祖国古老文明的辉煌。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和重要文化遗迹、重大历史信息不断显现,使得中国考古学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迅猛发展。

3. 党和国家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视与关怀,考古研究机构的建立和队伍的壮大,是中国考古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就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令、严禁盗掘、走私、出口文物,并颁发了《关于在基本建设过程中保护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的指示》,有计划地开展了一系列文物调查和田野考古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国家进一步确定了在基本建设中对历史文物和文化遗迹要“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对如何处理基建和文物保护矛盾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又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实践证明,这一方针和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完全适合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下去。

4. 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是中国考古学研究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我们从事各项工作和科学研究的指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提供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就能够把出土文物所显示的大量复杂的现象和历史信息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从而得出科学认识和正确理解。许多考古学家正是在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获得了思想的升华,加深了对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全面理解,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的。

5. 在前辈考古学者的艰辛开拓与新中国考古学者的奋发努力下,中国考古学自身理论建设的成就,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大跃进”的年代,老一辈考古学家夏鼐、徐炳昶、苏秉琦等诸位先生亲自参加田野考古实践,深入分析调查研究,对中国考古学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夏鼐先生的《关于考古学文化定名问题》,及时回答了什么是考古学文化、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准、考古学文化定名的条件、时间及如何定名问题,对考古学文化作了科学规范,为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以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者就如何研究中国考古学文化相互关系及文明起源诸问题,作了长期的探索和研究,反映苏秉琦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理论建树的主要著作是《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苏秉琦先生在一系列论著中明确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并具体阐述了文明起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阶段”发展论。“古国”、“方国”、“帝国”是国家形态发展的“三部曲”,“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草原续生型”是国家形成的“三模式”,这些论说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可见,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双百”方针,以科学地总结中国考古实践和提出的理论问题为核心,着眼于对考古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就会使中国考古学这门学科自身理论日臻成熟,这对于中国考

古学未来的整体的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我们在 20 世纪,特别是近 50 年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也深切感到,从全国各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水平来看,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差距较大的问题,例如,中原远古文化的基本序列已大体清楚,而边远地区古文化序列尚待继续深入研究。此外,我们的成果与我们田野考古发掘的面积、范围相比,还没有全部展示出来,全面系统的研究尚待加强。同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从多学科角度充分研究考古成果获得的历史与自然信息,还有待于总体规划,付诸实施。而对文物和文化遗址的科学保护更是我们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为此,我们应当在认真总结 20 世纪以来特别是 50 年来中国考古事业辉煌成就的同时,着眼于对未来发展方向作进一步研究,制定规划,突出重点,团结协作,攻克难关。我相信,中国考古学在新的世纪必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序

许倬云

“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在世纪交替之际召开,目的在对中国的考古学有所瞻顾。中国考古学,开始于70余年前,由于日本侵华,未能有发展的机会。过去50年来,中国考古学有了长足的进展。因此,我们对中国史前史的面貌,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这次会议,集合中国考古学界中生代的优秀工作人员,从各个方面检讨中国考古学的现状,大家提出的论文,涵盖面广泛,各组的讨论也极为深入。这些论文,集合成帙,正说明了这次大会的成果丰硕。我为此向参与大会的同仁致贺,更向组织会议及编辑文集的张忠培先生致敬。

中国考古学50年来累积的发现,最为可观的是新石器时代的各种遗存。遗址数量多,分布密,遂填实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片空白。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也补充修改了许多文献资料的欠缺,这一文集中,有关新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的论文,占了全书一半以上,正反映了这一现象。

50年来,我们对于中国古史的认识,从中原中心论,逐渐转变为文化多元论,从社会单线进化论兼顾为各个文化区系演变与互相碰撞。这些转变是学术发展的过程,由演绎走向归纳,新的理解,都从大量的资料中找出变化的线索。这一过程走了50年,终于走出迷宫。中国考古学有此成就,是几代考古学家胼手胝足的成绩。中国考古学提出的问题与解释,对于人类共同的历史,有其重要的意义,又岂仅是建构了中国地区的文化史而已。

我们尤其感念已故的苏秉琦先生,他的区系类型理论,及古国演化序列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讨论的灵感泉源。这次讨论中,苏先生的意见,不时在讨论中为人征引。我以为,下一阶段,我们可以尝试建构中国境内几个主要文化区内,哪些地方性文化逐步演化融化为区域性文化的过程?而在探讨这一过程时,我们也应更为注意那些个别时空中,各地特有生态环境对于文化聚合的影响。中国考古学累积的资料相当丰富,如果我们在建构文化逐级聚合过程时,能够提出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之间互相制约的一些解释与模式,则中国考古学不但展现其特色,而且可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有用的理论。

中国历史,传统上以中国疆域为限,易于使人有错觉,以为一切发展都在域内进行,其实,古代并无今日的国界线,任何地区的人类,都不断与其四邻有所接触,也彼此影响。讨论中国域内文化发展,我们必须注意中国邻近地区的情形。我们的邻近,如东北亚及东南亚,与中国地区之间,不仅有文化彼此影响,还有族群的迁移,这些活动,往往是人类文化史演变的动能,既有其对特定地区历史的意义,也有助于建构有关变化的模式。则中国地区的文化历史,不能局限于考察中国境内的问题而已。同时,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有若干

文化项目,例如栽培作物与工艺制作技术,在某处首先出现,然后传播他处,其传播时空距离可以相当漫长。以车为例,在亚洲内陆首先出现,然后向四方传播,中国古代的车型与建构,与埃及、印度、两河流域、希腊均甚一致。这种现象,既见于物质文化项目,也见于思想观念项目。我们必须承认,全体人类有大家共享的文化遗产。这本文集中,有数篇讨论华夏中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即是扩大视野的尝试。

研究中国古代史及史前史,考古学资料有文献史料可以互相参证。然而,两者之间,不能只是比附。举例言之,文献上有些族群的名称,未必即能直接引用,认作考古文化的族群。同样地,考古资料呈现的事物,有时与文献资料有所歧异,这种现象,往往也与两者指涉的社会阶层或地域差异有关,则不必强不同为同。文献资料中的礼制,尤有可能是后世学者建构的假设。更无须以为是考古学资料的典要。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例如卜辞、碑刻及铭文,则既是文献,又是考古得来的实证,其史料价值,可补充与核对已有的文献资料。这本文集中,也包含了数篇讨论这一类资料的文章,实为考古学与历史学重叠之处。

最近数年来,生物科技进展迅速,尤其基因研究,时时有所突破,中国考古学范围内,以基因研究人群谱系,还在起步阶段,我们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基因研究将成为重要的考古学研究工具,不但人类基因研究,可用于追溯族群亲统,家畜家禽及常用植物的基因研究,也可帮助我们了解人类迁移的路线。本书中有一篇即已注意于此。

今日考古学的方法,借助自然科学之处甚多,中国考古学已采用不少现代科技的观念与方法。然而,不可讳言,此中犹有不少发展空间。举例言之,自然生态的资料,在大多数考古报告均少见详细说明,甚至如地形及其相关资讯(例如遗址往往不见标高),遂致我们对古代人类生活不能有完整的了解。地质、地理的各项资讯,以及植被、土壤性质,在目前考古调查报告中,虽有而不多,至于遥感定测,聚落之间的区位关系……都还不是中国考古学报告的常见的项目。在此跨世纪的瞻顾之际,我们说此遗憾,盼望有弥补之日。

我是历史工作者,专业兴趣是中国上古史,考古学资料是上古史的重要史料来源。这次会议,我有幸结识不少考古学界的同仁,深为荣幸,更为得到学习机会,向各位与会同仁虔致感谢之忱。

以“世界的中国”的姿态迎接新世纪

(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代序)

张忠培

中国考古学从20世纪20年代诞生,经历周口店、殷墟和斗鸡台的发掘,再经过近50年来,特别是最近20年来的工作,已累积了比较系统的资料,产生了自己的技术和方法,提炼出了适合中国历史的理论,为再现中国历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考古学已进入了黄金时代。

当我们回顾中国考古学已走过的历程,一代、一代学人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发展树立起来的一座又一座丰碑,再一次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同时也见到的事实是:为中国考古学前进奋斗的学人,已处于新陈代谢的重要时刻,于80年代初前后走出校门参加考古工作的学人,已成为20世纪最后10年的中国考古学的主力军。我们怀着深切的敬意鸣谢先辈学者的同时,也清楚地看到现今的主力军,将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领导。

正确地认识历史与现实,是实现正确领导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会议基本上只邀请当代中、青年学者,尤其是中年学者参与讨论,并希望他们提出重要认识的原因。

这次会议除了追求上述目的外,还将就国外的中国考古学以及中国考古学一些前沿课题进行讨论。这些聚集在此的朋友,虽是来自不同地区与国家,讲着不同的方言和语言,然而,我们却都为考古学者,有着共同的使命,因此,我们相信通过这些学术讨论,会重温老朋友的情谊,结识新朋友,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共同把中国考古学推进到新世纪。

在这世纪之交的转换时刻,整个世界的国际化,令人瞩目。交通和通讯的进步,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地球相对缩小了,“地球村”的概念慢慢成形,我们也将“生活在没有国界的世界”中。历史学中的历史,既是历史当时的历史,同时又是当代史学的历史。21世纪将是走向“地球村”的世纪,人类的观念,也将随着现实的变化,改变原有的观念,出现新的意识形态,历史与文化观也将随之变化。苏秉琦教授生前说得好,“区系的中国是方法论”,“世界的中国也是方法论”,“把区系观点扩大为‘世界的’观点,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一方面在用区系观点看中国的同时,也用区系观点看世界”。我想当我们“用区系观点看世界”的时候,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不过是世界历史与文化中的几个乃至一个区系而已。当中国加快拥抱世界和“地球村”逐步形成过程中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虽然还不能确切而具体地讲清楚会出现哪些新的历史与文化的观念,然而可以指出的是上述“世界的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观,将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意识。让我们以此姿态走向世界,迎接新世纪到来吧!

目 录

回顾与展望

- 旧石器时代考古回顾与展望 王幼平(1)
- 20世纪后半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历程 张忠培(27)
- 夏商周考古学的回顾与展望 王 巍(42)
- 东周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许 宏(64)
- 世纪之交回顾香港考古 李浪林(74)
- 台湾考古学的回顾与前瞻 陈仲玉(83)
- 台湾生态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李匡悌(92)
- 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五十年 刘建华(103)
- 中国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朱 泓(118)
- 敦煌文献研究的世纪回眸 邓文宽(128)
- 20世纪墓志整理与研究的成绩与问题 任 昉(139)
- 考古地理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王妙发(151)

理论和方法的探讨

- 陶器谱系研究的问题与前景 冰 白(160)
- 聚落考古工作方法的尝试 赵 辉(166)
- 考古地层学及其作用小议 王炜林(173)

专题研究

- 环渤海地域新旧石器文化过渡问题研究纲要 谢 飞(181)
- 简论南中国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张 弛(190)
- 下王岗“仰韶文化一期”遗存试析 余西云(199)
- 辽西区古文化中的祭祀遗存 朱延平(207)
- 日照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聚落形态之研究 栾丰实(227)
- 大甸子墓地玉器及相关问题 杨 晶(245)
- 葛家庄先商遗存的几个问题 郭瑞海 任亚珊 贾金标(254)
- 邢墟考古简论 段宏振(264)
- 试论茹家庄西周墓地的器用制度——兼论西周后期器用制度的源流 曹 玮(274)

秦文化起源及相关问题再探讨	滕铭予(281)
水泉墓地及相关问题之探索	郭治中(297)
燕和周边的铜剑文化	村上恭通(310)
论辽西汉魏墓的乌桓文化因素	田立坤(317)
说玦	华玉冰(327)
汉代地方官僚结构——郡功曹之职掌与尹湾汉墓简牍之关系 ...	黎明钊(337)
河北瓷窑考古的几个问题	孟繁峰 王会民 张春长(365)
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聚落考古学的比较研究	徐光辉(381)
后记	张忠培(391)

旧石器时代考古回顾与展望

王幼平

中国从 1920 年第一件出自地层的旧石器发现开始,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已经走过 80 年的发展道路。如果按照 1903 年所报道的从中药铺买来的似“人”牙齿等零星的发现计算, 则已近百年。无论按照哪种算法,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都与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在这个世纪里, 经历了诞生、发展到逐渐走向成熟等不同发展阶段。许多学者曾经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史进行过讨论^[1]。回顾 20 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与工作特点, 大致可以看出三个比较明显的发展阶段: 从 20 年代或更早开始, 到 40 年代末, 是本学科的开端或者称初创阶段; 50 年代到 80 年代末, 是 20 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蓬勃发展的时期, 期间还可以划分出前、中、后几个小的阶段来; 90 年代以来, 则是本学科逐步走向成熟, 继续发展的新阶段。以下拟按时间顺序, 分别回顾 20 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阶段性成就与发展特点, 并展望本学科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与亟待努力的诸方面。

一、初创阶段 (20 世纪 20 年代 ~ 40 年代末)

(一) 最早的发现

1903 年, 德国古生物学家 Schlosser, M. 记述从中药铺买来的似“人”的牙齿, 这是关于中国早期人类的最初的报道^[2]。明确出自地层的最早的旧石器则是 1920 年 6 月发现的。法国天主教神甫、古生物学家桑志华 (E. Licent) 在甘肃庆阳县城北 55 公里辛家沟 (今属华池县) 的黄土层中部和城北 35 公里处赵家岔 (今亦属华池县) 的黄土底部砾石层分别采到 3 件石制品, 前者是一件石英岩多面体石核, 后者为两件石英岩石片^[3]。

1922 年 7 ~ 10 月, 桑志华在河套地区进行地质调查, 在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附近发现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1923 年桑志华与另一位法国学者德日进 (Teilhard de charlin, P.) 两人在河套地区进行更广泛的调查, 并在宁夏灵武的水洞沟和前述的大沟湾附近进行发掘。水洞沟附近发现有五处旧石器地点, 采集了大量的旧石器、少量哺乳动物化石, 并有用火遗迹发现。大沟湾附近也有动物化石与石制品的发现。另外还在运回室内整理时发现了一枚幼童的左上外侧门齿, 即后来所称的“河套人”。

上述发现由桑志华、德日进、布日耶 (Breuil, H.) 及步勒 (Boule, M.) 等人进行

研究,研究成果发表于1928年出版的法文版《中国旧石器文化》(Le Paleolithique de la China)。布日耶等人认为水洞沟发现的旧石器与欧洲旧石器相比,既有与莫斯特文化相似之处,亦有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初阶段的奥瑞纳文化接近的地方,当处在由前者向后者发展的半路上。到40年代前后,裴文中先生将这些发现放在一起称为“河套文化”^[4]。

1929~1931年期间,德日进与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到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与新疆等地进行新生代地层考察,也曾采集到石制品,其中包括发现于黄土与黄土底部砾石层的几十件旧石器^[5]。

(二) 周口店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与上述工作同时,北京猿人遗址也被发现并开始早一阶段的工作。早在1918年,周口店附近鸡骨山发现的古生物化石即引起当时在北洋政府任矿政顾问的瑞典学者安特生(Andersson, J.)的注意,最初的短暂考察虽然并无重要发现,但却揭开了周口店工作的序幕^[6]。1921年,安特生再与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兰阶(Granger, W.)、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Zdansky, O.)赴周口店地区考察时发现了龙骨山北京猿人遗址的洞穴堆积。他们不仅发现了动物化石,而且安特生还注意到堆积中的石英石片,认为可能与古人类的活动有关。随后,斯丹斯基于1921和1923年进行两次短期发掘,发现了两枚早期人类的牙齿^[7]。

从1927年开始,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主持,开始正式发掘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当年的工作由中国地质学者李捷与瑞典古生物学者步林(Bohlin, B.)主持。发掘的面积东西长17米,南北宽14米。发现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与一枚保存完好的人类左下第一臼齿化石。步达生(Black, D.)将人类牙齿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1928年的发掘工作由步达生、杨钟健与裴文中负责,开掘了一个20米长,12米宽的探方。收获非常丰富,除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外,还有很多直立人化石。直立人化石除多枚牙齿外,还有顶骨、额骨、下颌骨、肱骨与月骨等^[8]。不过在这两年的发掘中,仅集中精力于人类化石,堆积中丰富的石制品与用火的遗物、遗迹并未受到关注。

1929年,农矿部准予在中国地质调查所设立新生代研究室,并聘德日进为顾问。该所主持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1929年是北京猿人遗址发掘史上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工作由裴文中先生主持,发现了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与此同时,裴文中先生还注意到堆积中烧过和炭化的动物骨骼碎片,并发现一件具有打击痕迹的石英片。遗憾的是这个发掘项目的负责人步达生还没有马上认识到这些文化遗物发现的意义^[9]。在1930年的继续发掘中,更多的有颜色的骨片与鹿角片被发现,同时又有手工打击痕迹清楚的数件石制品发现。同年冬季,由德日进带回欧洲对骨片与鹿角标本进行比较与化学分析,这些发现的重要性方才开始得到肯定。

1931年的发掘在周口店第一地点鸽子堂区发现更多的石制品、烧骨、烧石及灰烬等。仅在石英Ⅱ层,就有数千件石英及其他岩性的石制品发现于54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其中灰土的化学分析结果与在欧洲的同类标本完全一致,使得直立人用火的能力得以确认。布日耶先生访问周口店遗址,肯定了裴文中先生的发现成果^[10]。1933年同时发掘周口店的第一地点(即北京猿人遗址)、第十三地点与山顶洞。山顶洞遗址发现于1930年。由于其堆积有别于前者,而未被马上发掘。经裴文中先生的努力,遂成为本年度的发掘重点。1933年到1934年头一季度的发掘,发现了丰富的人类化石与文化遗物。其中有三个完整的晚期智人头骨、部分头后骨及共存的文化遗物,可能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为研究人类进化与蒙古人种的起源与演化问题,认识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11]。

1934年的工作重点重新转到第一地点,同时也开始对十五地点的发掘。第二年由贾兰坡先生主持,继续这两个地点的工作。在第一地点有非常丰富的石制品与用火遗迹的发现。十五地点也发现了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与旧石器。1936年是周口店遗址发掘又一个丰收的年头。在属于下文化层的第二十五水平层,仅半个月时间里,就连续发现了三个直立人的头盖骨^[12]。与此同时,也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发现。1937年的发掘仍有丰富的人类化石、石制品与用火遗物、遗迹的发现。不幸的是由于卢沟桥事变的战火燃起,连续进行了10年的周口店发掘工作不得不停止。由此开始,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工作中断了长达10余年。

北京猿人遗址经过1927~1937年的10年工作,共发掘了20000立方米的堆积,获得5具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140余枚牙齿及一些肢骨等,共约代表40个左右个体。还有数万件石制品与上百种哺乳动物化石发现。这些资料为研究北京猿人的体质与文化特征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在这一阶段的工作中,魏敦瑞(F. Weidenreich)对北京猿人体质特征所做的详细研究十分重要。他所发表的五本专著,为北京猿人化石材料全部遗失以后的古人类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科学依据^[13]。

中外学者对北京猿人的石制品、用火遗存以及动物化石等也进行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1932年裴文中与德日进合作,对已经发现的北京猿人的石制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他们指出,北京猿人的石器系粗大的砾石石器与细小石器并存,而不见手斧;对原料的依赖性大,但已经懂得选用不同的方法与原料来加工不同用途的石器;依地层划分出A、B、C三个文化带,可以看出石器工业经历了从粗大向细小、精致的发展过程^[14]。1933年还出版了周口店工作的第一本综合性研究报告,即《中国猿人史要》(Fossil Man in China),简要地介绍了周口店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历史、地层与古生物、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文化等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15]。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发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在世界史前史上的重要地位逐步得以确立。

周口店遗址工作,也奠定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方法的基础。从1932年开始,裴文中先生总结以前的发掘工作,认识到“漫掘法”的局限性,开始尝试采用探沟与探方相结合的水平发掘法。发掘山顶洞遗址时,针对堆积的特点,采用1米×1米的探

方，以 50 厘米为一水平层，进行更为仔细的发掘。到 1934 年发掘第一地点与十五地点时，开始采用系统、规范的发掘方法，即一般所称的打格分方法。以 2 米×2 米为一探方，每 1 米厚为一个水平层。每一件标本上均标上发掘年份、工作日累计数、方格号与水平层号。这种方法可以系统、准确地记录考古发现的遗物，因而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使用一直到最近^[16]。

(三) 小 结

在 1920 年到 1949 年的 30 年间，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工作仅仅局限于华北、西北地区几个地点，参与工作的人员也很有限。然而这一阶段发现与研究成果的意义却非常重大，奠定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展基础，成为本学科发展的良好开端。西北地区旧石器的发现，打破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的认识，周口店的发现则证明早在直立人阶段，早期人类即已生活在中国大陆。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培养了第一代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先生等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奠基人的名字，不但已载入中国考古学发展史册，也享誉国际史前学界。在周口店发掘中确立的“水平方格法”，到 80 年代的旧石器考古发掘还在沿用。多条腿走路的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传统，也一直影响到今天。

作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30 年代期间，西北、华北地区，特别是周口店地区远古人类及其文化遗存的发现，也是中国史前考古学得以确立的重要支柱。

在世界史前考古学发展史上，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起步虽然较晚，但其起点却较高。周口店的发掘与北京猿人的发现，使得刚刚起步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就受到世人瞩目。中国远古人类与旧石器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北京猿人之前，已有爪哇猿人的发现。然而，关于爪哇猿人 (*Pithecanthropus erectus*) 在人类演化历史上的系统地位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发现北京猿人化石，特别是大量的石制品与清楚的人类用火遗物、遗迹的发现，大量共生的古生物化石的发现及明确的地质年代，使得直立人是人是猿的争论结束，其在人类演化史上的地位得以承认。

二、发展阶段前期 (20 世纪 50 ~ 60 年代初期)

(一) 周口店的继续发掘与研究

周口店的继续发掘与研究是本阶段主要的工作。北平解放伊始，停顿了长达 12 年之久的周口店发掘工作即得以恢复。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周口店遗址这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组织专业人员，着手整理标本，随后又制定发掘计划，拨出专款，重新开始发掘工作。并且修建了遗址陈列馆与有关的建筑设施。为改善交通状况，专门修筑了从广安门至周口店的京周公路。

从1949年秋季开始的发掘工作，由贾兰坡与刘宪亭先生主持。这一年的发掘，首先清理了1937年回填的土石，然后又发掘了125立方米的原生堆积。除了在坍塌的堆积物中发现的3颗北京猿人牙齿外，还有马、犀、猪及鹿类的牙齿，食肉类动物的粪便化石、碎骨片及截断的鹿角等发现。有些碎骨片与鹿角带有明显的人工打击痕迹。在1951年的发掘中，又有两颗直立人牙齿发现，同时还有动物化石与少量的石制品。与此同时，在清理碎骨标本时，还找到直立人的肱骨、胫骨各一小段^[17]。

1958年，再度发掘工作仍由贾兰坡先生主持。分别发掘了“东小洞”、“洞穴堆积中部的第13层与鸽子堂西部”。这一年的发掘，对地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洞穴堆积底部发现的扁角鹿化石及石制品，说明该层的时代应与十三地点相当，是周口店地区已知的最早的人类活动记录^[18]。1959年在第10层发现了一件比较完整的女性直立人下颌骨，同时在该层还发现扁角鹿与肿骨鹿共存的现象^[19]。

在整个50年代到60年代初，除了上述几次发掘工作外，周口店工作更多集中于资料整理与研究方面。在1954年和1959年举行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25周年和30周年纪念会的报告和有关的学术书刊上，有很多研究成果陆续发表。

关于北京猿人遗址堆积的划分，裴文中先生根据石器材料提出，至少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并认为分期的界限应在第5层与第6层之间。根据1958年的发掘与地层的观察，贾兰坡先生则提出划分为三个部分的意见，即下部（A组），包括第11~13层，含石制品很少，没有明确的北京猿人化石发现，亦不见肿骨鹿化石；中部（B部），包括4~10层，哺乳动物的种类基本一致，石制品亦无明显变化；上部（C组），包括1~3层，最后鬣狗等较新的哺乳动物出现，也有加工较进步的石器如似“石锥”的燧石尖状器发现^[20]。黄万波、卡尔克等先生也曾就堆积层位的划分及时代等问题发表意见。

在《对中国猿人石器的新看法》文中，贾兰坡先生提出，北京猿人曾用砸击法、锤击法与碰砧法三种方法进行剥片。修理石器的方法不仅有锤击法，也有碰砧法。除了一定的打片与修理方法外，石器还有一定的类型。工具应已有一定的分工，即刮削器不能用于砍伐，尖状器也不会用于锤砸^[21]。

在50年代的中后期到60年代初，对于北京猿人的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尚有较大的分歧。分歧集中表现在北京猿人石器的进步性与原始性的争论。从1957年始，到1962年止，围绕此论题，前后有20余篇文章发表。尽管由于当时的发现与研究水平所限，讨论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对于推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发展仍具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北京猿人体质特征的研究也有新进展。北京猿人的股骨、胫骨、肱骨、锁骨和月骨化石表明，其上、下肢骨的性质已经十分接近现代人，但其头骨则带有很多明显的原始特征。对此现象，步勒等曾提出，周口店北京猿人地点有原始的和进步的两种人类同时存在。但周口店多年的发掘结果，并无法证实步勒的观点。根据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吴汝康先生等对北京猿人的体质形态显示人体各部分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新的解释。他们认为，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两足直立行走的姿势应首先确立，手从原来的